

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》初探

郭成美

浙江省嘉兴市真教寺存有镌刻建寺“碑记”碑石，碑阴面并刻“重修”“碑记”。碑为明万历初年树立。现抄录两篇“碑记”于下，以供伊斯兰学者共赏；并试对“碑记”原文加了句读，并粗略评述，就教于方家。

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

赐进士第、同知嘉兴府事、前山东按察司副使、奉敕整饰天津等处兵备、新野马化龙撰文，赐进士第、知嘉兴府事、前南京礼部精膳清吏司郎中、邵阳车大任篆额，赐进士第、朝列大夫、南京国子监祭酒、前左春坊左庶子、纂修国史副总裁、经筵侍班官、郡人冯梦楨书丹。

真教之入中国，不详所自始，世鲜有通其说者；而习其说者，复不能自通。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，故寝以失其初意，而承讹袭舛，真派之堙且久矣。

夫其教原本西域，国自为俗，流入华土，各仍其世而守之，用以无忘厥祖。原非故标一异帜，庸以自别于齐民为也。其俗敬天尊主，乐善好施，而归本于清身心、戒杂秽、不事巫祝、不设神像、不化钱楮。其人相见，则以其语自通，藹如一家，有无相济，迺万里可无齋馮！有经三十藏，有篆隶隶法，率龙文鸟迹，不可测识。其清净，颇类道氏，而无其炼形服气之诬。其轮回果报之说，又类释氏，而无其泡影山河土苴

名义之幻。又率家诗户书，诵法孔子，冠进贤者，后先相望，无一人持梵空门受符玄篆者。其所趣向大较可睹矣。卑鄙者流，墨守其师说，而弗执于理；第于饮食起居，纤细琐屑之末，排异教如寇仇，争是非如聚讼，而人乃群起誉之。譬则狐祥自堕，旁道争鸣，宁诤得执为口实云者。

我高皇帝龙兴，徵本教郑阿里等十一人，命儒臣译其历，特为置司天监。文皇帝嘉米里哈只之谊，赐以玺书，特示旌异，金莹璧润，炳如日星，岂非以其说有禪王风，而实无所戾吾儒之旨，良亦有足迷乎！今其经具在，令得译如华言，以昭示宇内；宇内传而习之，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班行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，胡民俗江河至今日而浇漓极矣。妄希天网之疎，罔顾民彝之重，巧伪朋生，一室胡越；又何如人遵是教，而养忠爱之诚，复亲逊之化，不私其赏，不忘其本，犹有得于胞与之度，而旷然见古初之遗哉！

教人独杭省为最蕃，杭故有真教寺，宏丽甲天下，其行在禾郡者，久阙建寺。今教人马仲律等而各量力捐金，實得隙地于治东之通济桥南，稍仿杭制启建，以宣教谕焉。缔造既竟，白之先后郡守刘、车两侯。欲得垂之贞珉，列之郡乘，以杜外侮。为予孔焚修计。余适落拓此地，得阐扬而论说之，俾朝夕于兹者，

咸昭然通其大指，而因以晓流俗之人，使斯教永无晦蚀。则兹寺也，即与诸琳宫贝阙并峙，不朽可矣。

皇明万历三十年岁次壬寅秋九月朔旦。

嘉兴府知府车大任，同知马化龙，通判曹维藩、傅之任，推官王养俊，嘉兴县知县郑振先、秀水县知县陈于廷同立石。马仲律。

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

嘉兴府治东门内通济桥西，故有清真教寺，为隶教籍者礼拜之所。实始前明万历三十年间，有同知嘉兴府事马化龙为文志诸石。入本朝涵濡圣化百余年来，隶籍较多，逢国大庆则咸会于斯顶祝焉。岁久寺日倾圮。乾隆丙寅丁卯间，里人州司马沙翁大成遵赠公如金遗命，出金若干镒，嗣而葺之。殿堂廊庑，宏殿规式，又筑讲堂三楹于东。点垩丹漆，靡不具饰。而寺门犹存旧制，阅今二十余年。沙翁甥国子生郭君毅汾成勇氏未竟之志，请于有司，取吉改作，从其门而西之旧门遗址列屋五楹，而移讲堂于殿之西偏。重檐邃宇，增饰崇丽，足为斯寺庆遭逢矣。自甲午十二月经始至乙未六月告竣，独出金若干镒。从侄振麟驰书乞文于余。忆余奉命督储浙中时巡历所经见，今闻沙翁之能成亲志于前，郭君能继勇志于后，窃叹余不复能再至其地相与共落之也。爰据前后兴修本末，勒石于壁。其易清真曰礼拜寺者，从省会额制也。

赐进士出身、诤授通议大夫、浙江通省粮储道、前任福建台湾道、钦命巡视漕贵州副主考、江南道监察御史加二级、大兴金溶撰文，赐进士出身、诤授奉直大夫、左春坊左赞善提督、广东湖南学政教习庶吉士、甲戌丁丑会试同考官、丙子河南乡试正考官、会典方略通考国史

各馆纂修官、武汉殿校对官、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加二级、秀水郑虎文书丹，武林陈延锡字。

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》（以下简称《记》），镌刻于高二点一四米，宽零点八米，厚零点二五米的碑石之上。此碑立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。碑上竖刻二十五行文字，足行五十六字，共八百五十三字。撰文者马化龙，河南新野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是一位了解伊斯兰教，兼通道、佛、儒的穆斯林。他担任嘉兴府同知前，曾任常州府知事，修缮了常州池街巷清真寺。篆额者车大任，邵阳人，时为嘉兴知府。书丹者冯梦楨，本地人氏，著名文人，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清康熙《秀水县志》卷七“碑记”篇中录有全文，题为《嘉兴府新建真教寺碑记》，个别词字与《记》有异。

《记》碑阴面镌刻乾隆年间《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》，系阁帖式排列，共十六帖，每帖四行，足行十字，共四百七十七字。

《记》的一大特点是对伊斯兰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。《记》云：伊斯兰教“原本西域，国自为俗，流入华土，各仍其世而守之，用以无忘厥祖”。《记》接着说，这不是标新立异，只为有别于当地人。此节，讲清了在中国伊斯兰教之源流。

伊斯兰教信仰安拉为唯一造物主。中国一些涉及到伊斯兰教的早期文献曾有“天”的记载。如唐杜环《经行记》曰：“不拜国王父母之尊，不信鬼神，祀天而已”，“其俗礼天”；宋赵汝适《诸蕃志》称：“王与官民皆事天，……每日五次拜天”；元吴鉴泉州《清净寺记》云：“其教以万物本乎天，天一理，无可像，故事天至虔，而无像设”，等等。《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》说：“其俗敬天尊主”。“敬天”系同上述“祀天”、“礼天”、“事天”、“拜天”。“尊主”有二说，一为尊崇真主即安拉，二为尊崇君主。笔者认为《记》中乃谓君主。“敬天尊主”和

明永乐皇帝朱棣敕谕称的“敬天事上”一个意思。伊斯兰教入华，历唐、宋、元，到了明代，在其基本信仰的说法上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即从“祀天”、“礼天”、“拜天”、“事天”转为“敬天尊主”、“敬天事上”。较《记》作者马化龙稍后的汉文译著先驱们对这种“敬天尊主”说进行了更详尽的阐发。王岱舆《正教真诠·真忠篇》云：“人生在世，有三大正事，乃顺主也，顺君也，顺亲也”；“夫忠于真主，更忠于君父，方为正道”。马注《清真指南·忠孝》甚至称“人极至贵，莫尊于君”。产生这一变化，在于适应性很强的伊斯兰教在中国，使其信仰有了中国的特色。

《记》说，伊斯兰教“乐善好施，而归本于清身心，戒杂秽，不事巫祝，不设神像，不化钱楮”。伊斯兰教倡导施舍，如札卡特即法定的施舍，为“五功”之一，讲究清真为本，摈弃私心杂念，反对巫祝、神像，不似僧、尼、道士的向人求布施。“其人相见则以其语自通，藹如一家，有无相济，适万里可无齋焉”，是指穆斯林有共同语言和团结互助之美德。“有经三十藏，有篆草隶法，率龙文鸟迹，不可测识”。“经”指古兰经，“藏”谓册，“有篆草隶法，率龙文鸟迹，不可测识”，系指阿拉伯文。“又率家诗户书，诵法孔子，冠进贤者，后先相望，无一人持梵空门，受符玄策者”。由此可见，明末，中国穆斯林，特别是东南沿海穆斯林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。这在《记》中多有表述。伊斯兰教一般讲两世吉庆，不提“轮回果报”，此乃《记》一误。

《记》反映了当时当地穆斯林的状况，特别是指出其间存在的不良现象，并予以批评。《记》说：“世鲜有通其说者”，社会上了解伊斯兰教的人很少；“而习其说者，复不能自通”，学习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，自己也不能解释；“承讹袭舛，真派之堙且久矣”，反映了明代伊斯兰教在东南沿海地

区的日渐衰弱。此种现象有其政治，经济，文化的原因，如回回政治地位的下降，与阿拉伯国家海路交通的中断，汉文化的强大影响等。其本身原因何在？我们从《记》中可略知一二。“卑鄙者流，墨守其师说，而弗轨于理。第于饮食起居，纤细琐屑之末，排异教如寇仇，争是非如聚讼，而人乃群起訾之。譬则狐禅自堕，旁道争鸣，宁诘得执为口实云者”。使人感到当时穆斯林内部出现的问题十分严重。

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传播，和中国统治者对其态度与采取的政策有关。《记》记述了明朝皇帝对伊斯兰教的态度，云：“我高皇帝龙兴徵本教郑阿里等十一人，命儒臣译其历，特为置司天监”。此系指明太祖朱元璋诏回回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，并置回回司天监。“文皇帝嘉米里哈只之谊，赐以玺书特示旌异，金莹璧润，炳如日星”。是说明永乐五年(1407)，阿拉伯传教士米里哈只从海外来华，明成祖朱棣亲自颁发了敕谕，盖上“永乐之宝”的玺文，扬州、泉州、西安、松江等地的清真寺刻碑中提到此敕谕。敕谕内容为：

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：朕惟人能诚心好善者，必能敬天事上，劝率善类，阴翊皇度。故天赐以福，享有无穷之庆。尔米里哈只，早从马哈麻之教，笃志好善，导引善类，又能敬天事上，益效忠诚。眷兹善行，良可嘉尚。今特授尔以敕谕，护持所在，官员军民，一应人等，毋得慢侮欺凌。敢有故违朕命，慢侮欺凌者，以罪罪之。故谕。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。

《记》将伊斯兰教附会迎合儒学，称：“其说有裨王风，而实无所戾吾儒之旨”。这从另一侧面反映，明皇室对伊斯兰教态度之好恶，取决于它认为伊斯兰教是否有裨自己的统治。

穆斯林中有识之士对伊斯兰教在明代的衰微之势十分关注。《记》作者鲜明地提出

了汉文译经的主张。“今其经具在，令得译如华言，以昭示宇内。宇内传而习之，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并行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”。作者马化龙欲通过汉文译经振兴中国伊斯兰教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。与此同时，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的泉州《重修清净寺碑记》中对汉文译经问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保守性的意见。可以看出，在汉文译经上，明末穆斯林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，出现“译”与“不译”针锋相对的意见。马化龙审时度势，远在十七世纪初，呼吁汉文译经，表达了中国穆斯林的愿望，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，确是难能可贵。

伊斯兰教入华，《记》云：“不详所自始”。何时传入嘉兴，曰：“教人独杭省为最蕃，杭故有真教寺，宏丽甲天下，其衍在禾郡者，久阙建寺”。“禾”为嘉兴之别称，“久”指多久，难以揣测。嘉兴澉浦，乍浦分别于宋、元置市舶司，开港贸易。“番舶皆萃于浦”，①“番舶凑集，居民互市”，②澉浦旧有“回子巷”，③元大德五年（1301）嘉兴海运副千户杨枢“舟楫糗粮物器之类”④至西洋，到了波斯湾的沿海城市忽鲁漠斯。元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的《海宁州安民碑》⑤中提到的马合谟、兀伯都刺、法忽鲁丁、咬住等，显然为穆斯林无疑。此碑年代和杭州真教寺、松江真教寺的建造为同一时期。可见，穆斯林来禾时间比明万历三十年建嘉兴真教寺早得多。元代嘉兴回回人不少，何以无寺？何以迟至明万历年始建清真寺？令人不解。嘉兴穆斯林中传说东门角里街曾有座宋建清真寺，但无佐证，只能存疑。

嘉兴元代回回人不少，明清建寺修寺，穆斯林更多。据《记》和《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》载，明代有马仲律等，清朝有沙、郭诸姓，且“隶籍较多”。物换星移，到清末民初，嘉兴穆斯林荡然无存。现今嘉兴穆斯林韩、马、李、杨等姓均系民初以后从河

南、山东等地迁来。

伊斯兰教在杭州的传播，对毗邻的嘉兴影响颇大：穆斯林从杭衍禾，清真寺“稍仿杭制启建”；寺名，《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》称“从省会额制也”。

嘉兴清真寺寺址，《记》云：“于治东之通济桥南”，而《重修嘉兴府礼拜寺碑记》却说在“治东门内通济桥西”，两说孰是？诚如方豪《浙江之回教》所言：“寺实在桥西南，两说各有所偏也”。

据碑帖，《记》尾“马仲律”三字，笔迹粗糙，和整个碑文字体有异，非一人之笔，抑或是马仲律或其后人添上去的。

注释：

①弘治《嘉兴府志》卷十七。

②天启《平湖县志》卷一《疆域》。

③④光绪《嘉兴府志》卷四：50。

⑤碑藏海宁博物馆，碑文载《嘉兴市城镇经济史料类纂》385页。

安徽伊协召开二届二次委员会

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二届二次委员会于1990年12月20—21日，在省会合肥召开，来自全省17个县、市的21位委员出席，合肥市特邀代表1名列席。

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召开的。会议审议了省伊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；讨论、通过了《安徽省伊斯兰教清真寺管理办法》。会议还就省伊协今后有关阿訇接班人的培养、清真寺的自养以及推动本省穆斯林投身于“开发皖江”的建设等方面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。

21日下午，省委统战部、政协、民委、宗教事务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并讲了话。

（张旭东）